



试论马桥文化鸭形壶的来源与传播



陈 钰 (南京大学历史系)

马桥文化时期,在马桥文化的遗址分布范围内广泛流行着一种形似鸭禽的器物,有学者称之为鸭形壶。就目前发表的材料看,鸭形壶除主要在上海马桥遗址发现较多外,在江苏吴县澄湖遗址、查山遗址,浙江江山肩头弄遗址、嘉兴新塍等都有发现。另外,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发现一件,有学者称之为鸭形鼎。对于这种鸭形器的来源,去向和传播的问题,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笔者拟结合新材料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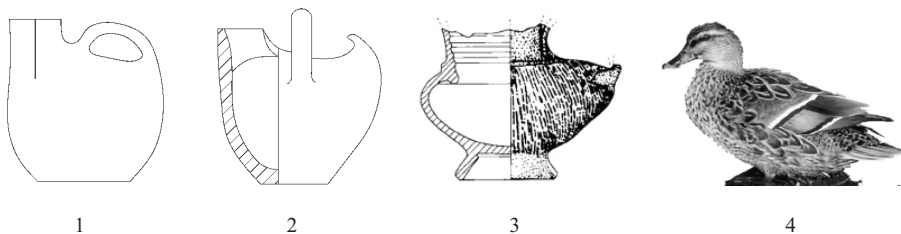
马桥文化中的鸭形壶总体特征是敞口,粗高颈,扁腹,似鸭形,一侧附半环形扁釜。陶系以泥质红褐陶为主,腹部多饰条纹,少量饰席纹、叶脉纹和云雷纹,亦有素面者。根据器形特征,宋建先生将其分为三型:A型:底附圈足,器物内外表面多为灰褐色,中间夹红褐、紫褐等不同颜色;B型:圈底或凹圆底;C型比较特殊,为假圈足,颈部和扁釜上饰云雷纹,较为罕见,仅上海马桥遗址中发现一件。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那件鸭形鼎,夹砂灰陶,矮领,乳钉足,鼎腹似鸭形,背部有宽带状单耳。颈腹间饰划纹一周,下加剔刺纹,形似项链。腹壁一侧饰划纹,一侧饰篦纹,似羽毛状。耳饰人字纹和铆钉,形象较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更为生动。检索二里头文化历年的发掘资料,这种鸭形器在二里头文化中只发现了一件,显然不是其典型器物,也不是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从时间上来看,二里头的鸭形器出土于偃师二里头一期墓葬中,基本与马桥文化发现的鸭形壶时间相一致。从数量上来看,迄今为止,已报道的鸭形壶以马桥文化的为最多。虽然马桥文化中的鸭形壶主要是圈底和圈足两大类,并没

有发现三足鸭形壶,但是器物的整体造型却很相近。据学者有关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来看,这两地有着广泛的交往,并且在交往中存在着文化因素的双向互动。据此,笔者推测二里头遗址的鸭形鼎可能是中原地区接受南方文化影响的一个表现。

从以上论述来看,二里头文化的鸭形壶应来源于马桥文化,如此,则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当另作讨论。

关于马桥文化中鸭形壶的来源问题,目前学术界分歧颇多,如陈国庆先生就认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应是来源于良渚文化的皮囊式壶和鸟形提梁壶^①,但结合考古新发现及其他前辈学者的论述,笔者认为,虽然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重叠——都是以太湖地区为分布中心,而且不排除马桥文化中带有部分良渚文化的因素^②。但是,从良渚文化澄湖古井群已发表的皮囊式壶和鸟形提梁壶^③来看,与前述马桥文化的鸭形壶特征稍异。鸭形壶似鸭禽,形象生动,壶腹较扁似鸭腹,并有尾部略上翘者更为逼真。这与野鸭的野鸭腹部为扁长形,尾端上翘但不明显等生物特征甚为相似。对比良渚文化的皮囊式壶和鸟形提梁壶,这两者的最大腹径与高的比例都近似方形,鸟形提梁壶尾端虽有上翘但已近内卷,这与野鸭形态有较大差异;另外,时间上来看,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在年代上是



图一 良渚文化的皮囊式壶、鸟形提梁壶与马桥文化鸭形壶、野鸭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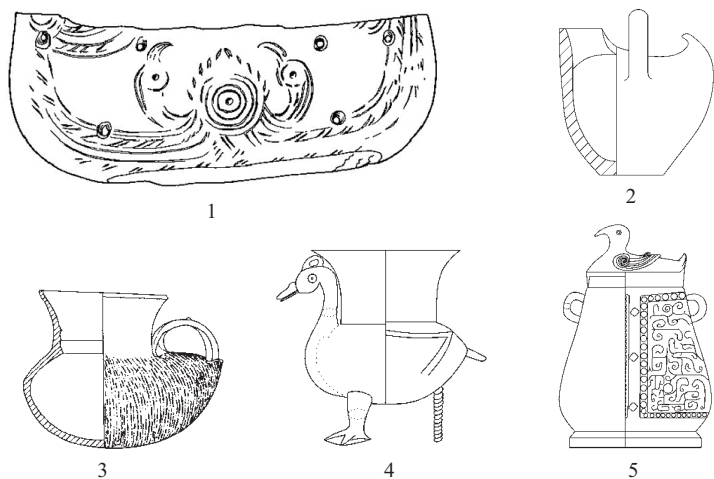
1. 澄湖遗址皮囊式壶 2. 澄湖古井群鸟形提梁壶 3. 马桥遗址Ab式鸭形壶 4. 野鸭

有一定距离的。近年来随着广富林文化在太湖地区的认识和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的第三次发掘,发现钱山漾一、二期文化年代晚于良渚文化而早于马桥文化,基本填补了从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之间的缺环^⑭。而在钱山漾一、二期文化中尚未发现类似的壶。故上述关于鸭形壶起源于良渚的观点是值得斟酌的。

在探讨马桥文化中的鸭形壶起源时,不得不提的是宋建先生的观点。据他研究,马桥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浙南闽北地区以江山肩头弄期第一单元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⑮。而在属肩头弄期一单元的江山大桶后山出土过一件鸭形壶,其具有直领粗矮,侈缘,深腹,一侧的领、腹界限不明显,凹圆底,尖圆尾不上翘^⑯等特征。根据上述特征,宋建先生认为此鸭形壶与马桥文化两种鸭形壶形态上的递嬗关系十分清楚^⑰,亦即是说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以肩头弄期一单元为代表的文化遗存。

针对这一观点,有学者根据新近的发现提出异议。如曹峻先生的研究就认为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在文化因素的传播方向上并不是肩头弄类型由南往北的单一流向,还有些文化因素是马桥文化自创、且由北往南传播的。而鸭形壶正是由马桥文化自身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并且作为马桥文化的典型代表因素而向外传播^⑱。

应该说,在目前相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上述观点都有成立的可能。结合近年来出土的新材料,笔者认为,马桥文化中出现大量形态生动的鸭形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首先,这种鸭形壶的制作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长江下游地区自河姆渡文化时期开始便存鸟禽崇拜的文化习俗,关于这点已有很多学者做过详细的研究^⑲。虽然对于鸟禽崇拜的原因说法不一,但无疑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据研究表明,在距今7000~6000年前,河姆渡气候温暖湿润,地理地貌属丘陵山地与沼泽平原的交接地带^⑳。沼泽湖泊中适合鸬鹚、鹭、野鸭等各种水鸟栖息,并且据考古报告显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各种鸟类遗骨中,大部分也正是水鸟,这就为河姆渡先民崇拜鸟禽的意识提供了直观的依据。而同样的,在马桥文化时期,



图二 长江下游地区的各种鸟禽形器

1.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文化象牙蝶(鸟)形器(T226(3B):79)
2. 澄湖古井群鸟形提梁壶(74Wch 采 39)
3. 马桥遗址鸭形壶(TD101:16)
4. 丹徒母子墩鸳鸯形尊
5. 丹徒母子墩飞鸟盖双耳壶

太湖地区气候温湿,湖沼密布^㉑,自然环境适合水鸟生存,这种受自然环境影响而产生的鸟禽崇拜意识更表现在长江下游地区的物质文化中。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进一步地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河姆渡文化时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匕(T21(4):18)正面饰有连体鸟纹图案两组^㉒。良渚文化时期,江苏省吴县草鞋山出土良渚文化陶壶(草 M198II)上也发现了鸟纹饰^㉓。除鸟纹饰外,当地先民们更将这种形象模拟制作成各种实物,如河姆渡遗址第一到三期文化遗存中的碟(鸟)形器^㉔,澄湖古井群的良渚文化遗存中的鸟形提梁壶,江苏省丹徒母子墩墓出土的鸳鸯形尊和飞鸟盖双耳壶^㉕(图二)。由此可见,长江下游地区的鸟禽崇拜意识由来已久,且在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结合鸭形壶的水鸟造型,笔者认为,马桥文化中的鸭形壶也应是当地人们的鸟禽崇拜意识在物质创造中的体现。

其次,从陶质陶色上来看,马桥文化的鸭形壶以泥质红褐陶为主,部分施有黑色涂层,其次为泥质灰陶。据学者统计研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是马桥文化中的大类^㉖,而在良渚文化中,泥质灰、黑陶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且在其后的广富林文化,和年代晚于良渚文化而早于马桥文化的钱山漾一、二期文化^㉗中都含有大量的泥质灰、黑陶器。因此可见,马桥文化泥质灰、黑陶系当是承袭于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末期文化。马桥文化的红褐陶系在太湖地区找不到继承的文化传统,却与太湖以南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有着紧密联系^㉘。此外马桥文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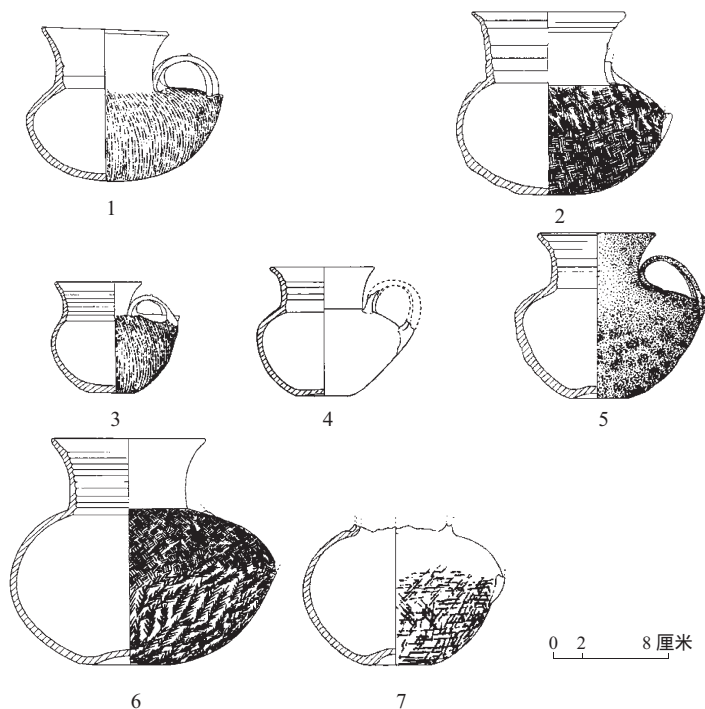
有少部分器物表面施有黑色涂层,有学者将其称之为“黑衣陶”,根据新近的考古材料,这种黑衣陶在浙南闽北地区有着较多的发现,是“葫芦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②。如此看来,在陶质陶色上,马桥文化在继承本地固有文化因素的同时也接受了来自太湖以南地区文化的影响。

再从纹饰上来看,马桥文化鸭形壶的纹饰以腹部饰条纹,扁釜上贴小圆丁为主,其次为腹部饰席纹、叶脉纹和云雷纹。据学者的统计,年代上属于马桥文化早期第1段地层的红褐印纹陶片上所饰纹饰中,以条格纹和条纹的数量为最多,其次是叶脉纹、席纹、折线纹、方格纹等^③。如果以大区域的眼光观之,马桥文化作为江南印纹陶文化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其鸭形壶上的条纹、席纹和叶脉纹在南方各地的印纹陶中都比较普遍,如条纹就在钱山漾一、二期文化中有所发现。据此可以认为,早在新石器晚期,南方的早期印纹陶文化因素就对太湖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在鸭形壶产生之初,其造型与纹饰都应比较单调,而条纹作为新石器晚期时就进入太湖地区的纹饰,很可能是鸭形壶最先使用的一种纹饰。之后随着马桥文化的发展,鸭形壶的造型与纹饰也愈加丰富。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当是马桥文化时期当地先民对鸟禽崇拜的意识,结合了太湖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而在马桥文化分布区内所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

马桥文化创造出这种鸭形壶之后,是否又将这种文化因素向周围扩散,则是本文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前文在分析纹饰的时候曾提到,马桥文化鸭形壶最早使用的纹饰应是条纹。而马桥文化的鸭形壶中,圈足鸭形壶腹部都饰有条纹,而圆底或凹圆底鸭形壶腹部纹饰则比较丰富,除饰条纹外,另有席纹、叶脉纹等。故而从纹饰上来看,前者当早于后者。这一观点,在笔者认真分析了与上述两种鸭形壶共存的器物之后,更是十分明了。

整体来看,马桥文化中的鸭形壶可分为三型。关于A型和C型,宋建先生在报告中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笔者基本赞同他的观点,兹不赘述。因



图三 马桥文化B型鸭形壶

Ba 式:1. TD101:16 Ba 式:2. T1033③D:12 Bb 式:3. T1119③E:5
Bb 式:4. T22③:1 Bb 式:5. H9:1 6. T1022③C:2 7. J109:2

此,笔者仅对B型进行简要的分析。马桥文化的B型鸭形壶,根据腹部的深浅,可分两小类,各小类又可依据器形特征进行分式。

Ba 型 浅腹。根据尾部及底部特征可分两式:
式 圆底,尾部较平。标本 TD101:16,泥质灰陶,腹部饰条纹,扁釜上贴小圆丁。口径 8.8 厘米,高 10.8 厘米(图三,1)。

式 圆底近平,尾部下垂。标本 T1033③D:12,泥质陶,灰褐色,质较硬,腹部饰叶脉纹和席纹,扁釜残缺。口径 11 厘米,高 12.9 厘米(图三,2)

Ba 亚型鸭形壶的演化轨迹主要是尾部由较平向下垂发展,底部圆底有变平趋势。

Bb 型 深腹。根据尾部及底部特征可分三式:
式 圆底近平,尾部较平。标本 T1119③E:5,泥质紫褐陶,施黑色涂层,质硬,腹部饰条纹,扁釜贴泥条和小圆丁,口径 6 厘米,高 7.7 厘米(图三,3)

式 圆底微凹,尾部下垂。标本 T22③:1,泥质红陶,素面,扁釜残缺,口径 7.3 厘米,高 9.5 厘米(图三,4)

式 凹圆底,尾部下垂且尾部不明显。标本 H9:1,泥质灰褐陶,素面。口径 8.6 厘米,高 12.2

厘米(图三,5)标本 T1022③C 2,扁釜残缺。泥质红陶,腹部饰席纹和叶脉纹。口径 10.8 厘米,高 16.2 厘米(图三,6)标本 J109 2,口径和扁釜残缺。泥质灰褐陶,质较硬,腹部饰条纹,比较乱。残高 9.2 厘米(图三,7)。

Bb 亚型鸭形壶的演化轨迹主要是尾部由较平向下垂发展,并且尾部有退化趋势,底部由圆底近平向内凹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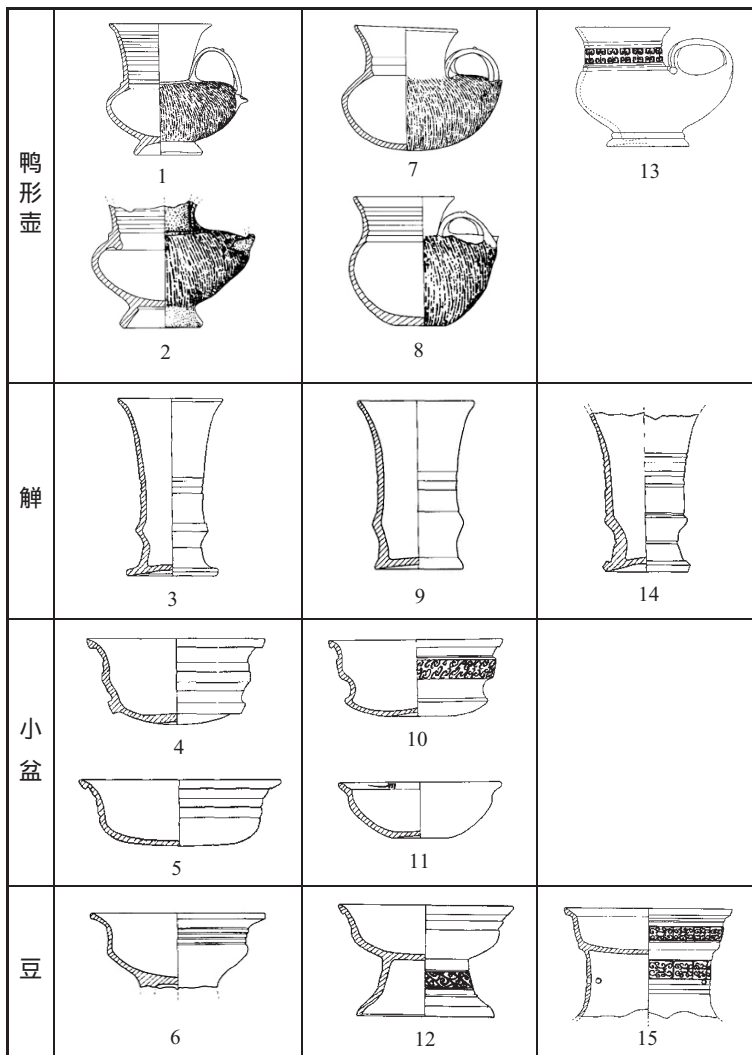
整体来看,B 型鸭形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尾部特征上,即尾部由较平向下垂发展,且呈退化的趋势。来自地层的证据也基本支持上述的变化趋势,如与 Ba 式共出的觥、甗等均具有较早的特征,而与 Ba 式共出的器物则不具备这些特征。另外一方面,上述结论与马桥报告中有关 A 型鸭形壶的变化趋势又有所重合^⑤。如此来看,B 型鸭形壶中的部分虽与 A 型鸭形壶存在并行发展的可能,但整体时代当晚于 A 型。此外,笔者依据宋建先生有关马桥文化的分期为前提,将与 A 型、B 型和 C 型鸭形壶同出的器物进行排比(图四)后发现,A 型式鸭形壶当是最早产生的鸭形壶。A 型式鸭形壶产生之后,随即向两个方向演化,一是继续保留圈足,即 A 型的演化趋势;二是圈足消失,即 B 型的演化趋势。结合前述有关纹饰的论断,笔者认为马桥文化中圈足的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当早于假圈足和圆底或凹圆底的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并且鸭形壶在其发展过程中尾部呈现退化的趋势,总体形象由比较像鸭形向不太像鸭形的方向演变。

伴随着马桥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鸭形壶在马桥文化中产生之后又向外进行了扩散,除了上文提到的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鸭形尊是来自马桥文化之外,肩头弄期一单元的鸭形壶与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应该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从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的关系来看,虽然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肩头弄第一单元文化向北扩张是马桥文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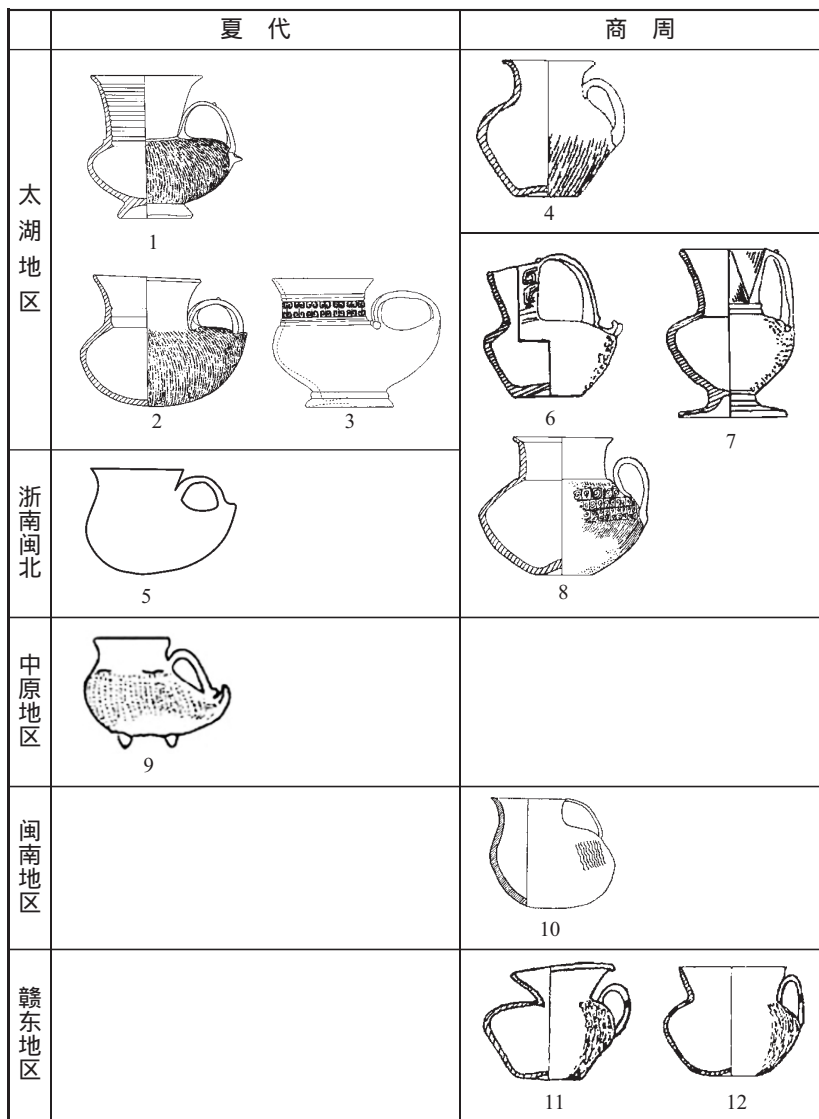
成的主要因素^⑥,但也有学者根据考古新材料研究认为马桥文化的主体部分不是发源于浙西闽北山地^⑦。并且还存在着马桥文化向肩头弄类型传播的可能^⑧。单就鸭形壶来说,肩头弄仅出有凹圆底者,如果笔者关于圈足鸭形壶早于圆底或凹圆底鸭形壶的结论无误的话,那肩头弄期一单元仅有的凹圆底鸭形壶应该是受到马桥文化影响的结果。

然而在马桥文化之后,这种特征明显的鸭形壶也随之少见,需注意的是在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出现了一种与鸭形壶形态相似的鬻形壶。此类鬻形



图四 马桥文化鸭形壶及共出器物

1. Aa 亚型鸭形壶(T719③F:11) 2. Ab 式鸭形壶(T918③F:28) 3. Aa 亚型式觥(T719③F:13) 4. Da 亚型式小盆(T719③F:12) 5. Db 亚型小盆(T719③B:2) 6. Aa 亚型式豆(T918③F:23) 7. Ba 亚型式鸭形壶(TD101:16) 8. Bb 亚型式鸭形壶(T1119③E:5) 9. Aa 亚型式觥(TD101:5) 10. Cb 亚型小盆(TD101:7) 11. Ed 亚型小盆(T1119③E:3) 12. Db 亚型豆(TD101:8) 13. C 型鸭形壶(T623③D:10) 14. Aa 亚型式觥(T623③C:19) 15. Ca 亚型豆(T623③D: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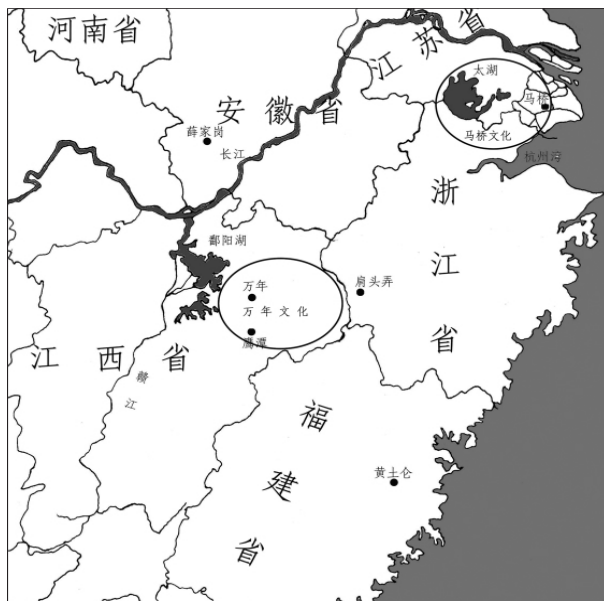
图五 鸭形壶的演化及分布

- 1、2、3. 上海马桥遗址
4. 亭林遗址上层
5. 江山肩头弄遗址
6、7. 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
8. 福建光泽池湖 M9
9. 二里头遗址
10. 福建南安民安村
11、12. 江西鹰潭角山窑址
(1、2、3 分别为马桥文化 A 型、B 型与 C 型鸭形壶, 6、7 分别为黄土仑 型与 型鬲形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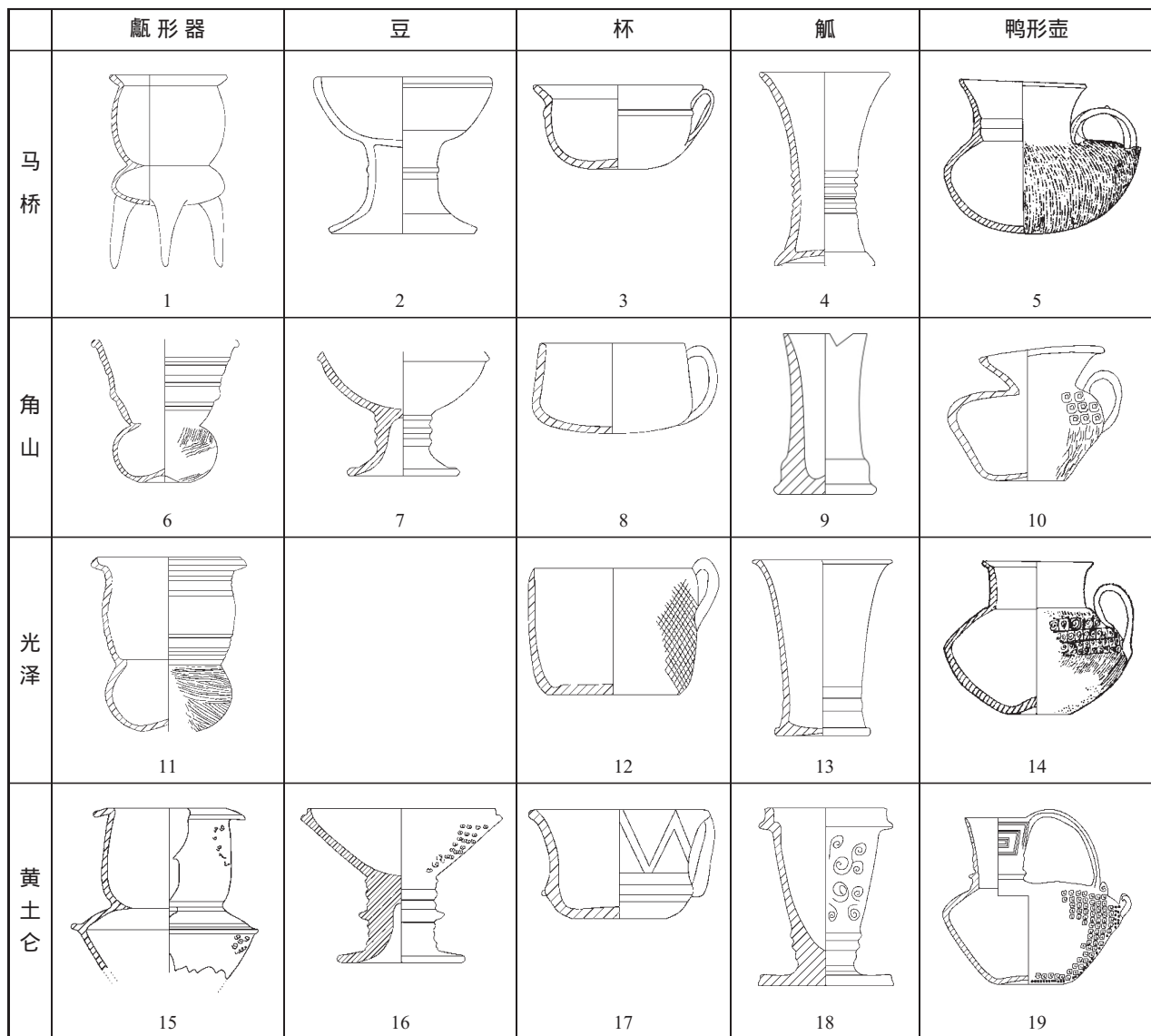
见的壶、鼎、罐、钵等所统治,如亭林上层的鸭形壶,鸭尾已明显退化,更像是带把的高颈壶^⑪。之后此类造型生动的鸭形壶亦罕见踪迹,但其影响却并未因此而停止(图五、六)。

在福建光泽池湖的商周墓葬 M9 中出土的 B 式单鬲罐,口沿微外侈,长颈扁鼓腹,凹底,单鬲附于肩部。例如 M9:34 泥质灰硬陶,腹为云雷纹及绳纹复合装饰,器表黑色涂层似釉有光泽^⑫。相似的材料在江西鹰潭角山窑址中也出现了两件。这两件器物均为泥质灰色硬陶,敞口,束颈,圆肩,弧腹,平底内凹,肩部按一个宽带状环把。这几种罐

壶,也有学者称之为禽型壶^⑬,鸭形壶^⑭。已发表的鬲形壶共四件,按其形制分为两型。型:细高颈,喇叭口,壶腹后部较长尾部上翘,口沿与肩部之间连接一宽带状鬲,鬲面饰数道平行条纹,颈部刻划双线回形纹或三角平行斜线纹,腹部拍印方形或菱形雷纹。型:粗颈,有流。口沿与肩部间附宽带状鬲,鬲面作数道平行条纹,上端施卷云形泥条附加堆饰四个。颈部阴刻三角形平行斜线纹,肩腹部拍印方形雷纹,矮圈足外撇^⑮。从鬲形壶的总体形态上看来,型鬲形壶与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有些相似。黄土仑的一个碳 14 年代是距今 3250 ± 150 年的商代晚期^⑯。有学者认为这两型鬲形壶在昙石山文化中是找不到源的,当是由马桥文化通过高祭台类型传播而来,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⑰。进入后马桥文化时代,东南沿海地区的日用器物逐渐为常



图六 马桥文化鸭形壶传播路线示意图



图七 马桥、角山窑、福建光泽池湖、黄土仑遗址出土器物对比图

1. D10:23 2. T1:6 3. H12:1 4. T1233③D:13 5. TD101:16 6. 童采:58 7. 83板 H1:23 8. 角A:5 9. 86板 H1:26
10. 86板 H1:18 11. M9:77 12. M10:4 13. M9:62 14. M9:34 15. M12:3 16. M3:6 17. M7:8 18. M12:4 19. M3:13

的整体造型都类似于鸭尾退化的鸭形壶^③。根据新近的材料,福建光泽池湖商周墓葬出土的有些器物与闽江下游的黄土仑及鹰潭的角山相比较几乎无异于如影随形^④。而这些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与同时代长江下游地区有着密切的交往。如福建光泽池湖商周墓葬、江西鹰潭角山窑及闽侯黄土仑墓葬出土的一些器物与马桥文化中的器物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图七)。整体来看,黄土仑的两型鬲形壶及福建光泽和鹰潭角山窑址的单鬲罐都是受到了马桥鸭形壶的影响。

在上述鸭形壶传播的主要区域之外,闽南南安

曾出土过三件带鬲罐,此器物系软陶,手制,有一件为手轮兼用,敞口,口偏于腹前部,有鼓腹和大腹两种,腹后部略似鸭尾,圜底,印绳纹或条纹,鬲上有附加堆纹^⑤。根据当地的文化背景因素及同层出土的其他器物特征来判断,这三件带鬲罐的大致年代应不早于夏代。另外在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的夏商文化层中出现过一种陶鸟形器,整体呈鸟形,鸟首残缺,内中空,鸟背上有半环形提梁,平底略内凹^⑥。这种鸟形器在当地比较少见,笔者推测这两种器物均是马桥文化在向南与向西北传播过程中而对其产生的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是在当地先民鸟禽崇拜的意识支配下在马桥文化分布区域内自身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之后随着马桥文化与北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向西北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对皖西南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其与南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又传播到了浙南的肩头弄类型,并影响到了闽北地区,直至闽南。后马桥文化时又对赣东北地区和闽西北地区产生了影响,但此时鸭形壶的鸭尾已明显退化。

注释:

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1期;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②⑤、②⑧ 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

孙维昌:《上海市金山县查山和亭林遗址试掘》,《南方文物》1997年3期。

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牟永抗:《浙江的印纹陶》,《文物集刊·3》,文物出版社,198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中将马桥文化中的陶器分为夹砂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泥质红褐陶四系,而红褐色系其色调从橘红、红褐、灰褐、到紫褐色不等。文章将马桥文化中器表为灰褐色和中间夹红褐、紫褐色等不同颜色的鸭形壶均归为红褐色系。

③③ 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八章,第三节,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①①、①⑤、①⑦ 陈国庆:《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鸭形壶》,《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①②、①⑥ 宋建:《马桥文化探源》,《东南文化》1988年1期。

①③ 此件皮囊式壶总体特征是:磨光黑陶制成,形体扁,似一皮囊,背部有一提梁,素面。参见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

①④、②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

①⑧、③①、③⑤ 曹峻:《试探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南方文物》2010年1期。

①⑨ a. 陈勤建:《中国鸟信仰·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 b. 蒋卫东:《涡纹·湖沼崇拜·鸟形器》,《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⑩ 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②⑪ 曹峻:《略论自然环境在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东南文化》2004年第3期。

②⑫、②⑭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②⑮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②⑯ 曹峻:《马桥文化再认识》,《考古》2010年第11期。

②⑰、③④ 焦天龙:《论马桥文化的起源》,《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③① 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相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社科)1981年第1期。

③② 笔者总结马桥报告中对A型鸭形壶的分式研究发现,A型鸭形壶的演化轨迹主要是尾部由略上翘到近平,再演变为下垂,尾部有退化趋势,而根据笔者对B型鸭形壶的分析来看,B型鸭形壶具有尾部由较平到下垂,并伴随退化的表现,那么由此看来B型鸭形壶最早也应在形如Ab式鸭形壶产生之后才出现。

③③ 杨楠:《江南土墩遗存研究》第143页,民族出版社1998年。

③④、④①、④④ 陈国庆:《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鸭形壶》,《东南文化》1991年5期。

③⑤、③⑨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

④① 宋建:《论马桥文化的时空结构》,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② 福建博物院:《福建光泽池湖商周遗址及墓葬》,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④③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鹰潭市博物馆:《江西鹰潭角山窑址试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1期。

④④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闽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61年第5期。

④⑤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第452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本文讨论的所谓早期镬是指西周中期以前的 20 件镬。作者首先对早期镬即最早的商末江西新干镬到西周早、中期及至东周以后的鸟饰扉棱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揭示,次而对早期流行于湘江流域的四虎镬扉棱的虎饰与商晚四虎大铎和虎纹铎进行比较,指出这是同一类型在青铜器上的运用,并就铜器上的虎纹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阐述,指出它并非如王黼《宣和博古图》中所宣传的是为了节乐而防忧生,而应是与原始信仰和崇拜有关,将这些或写实、或神化的动物形象铸于器表,是人类内心的恐惧敬畏在现实世界的物化形式与精神寄托。

在对四虎镬的比较和阐述基础上,作者更对四虎镬的形制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揭示。粗观四虎镬,大小相近,甚至经过测音的三件形体相近的四虎镬的音高也相近,然而细而观之,细微差别众多,如兽面形象不一,枚数与枚形各异,甚至扁身虎纹和虎尾样式也差别明显。在大约相同的区域内,这种细微差异,过去的研究者也曾注意到,但一般都作为非主流现象而忽略不计,仍都看成是同一时代的铸品,但本文作者却认为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极有可能是历史演变造成的,是设计制造与享用者自身的审美观念发生转变的结果。为了更证实这一观点,作者还特别通过对六件四虎镬腔体的分析,揭示出镬腔体的演变是经历了从椭圆形腔与圆角方形腔向合瓦形腔的转变,并最终定型于更加符合声学需要的合瓦形的腔体。并指出这一转变,绝非成于一朝一夕之间,是伴随着古人对镬音乐表现能力逐渐增强的一个长期的过程,故这六件四虎镬应同属湘水地区不同时代的产物。

商周青铜礼乐器种类甚多,对某一类礼乐器进行宏观研究,还时有所见,而对某一类礼乐器的局部特征如此文对“镬”这种乐器的扉棱特征进行微观研究,至今似甚少见,这是当今我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表征,尽管有的问题尚可进一步讨论,但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认识,不仅对“镬”这种礼乐器,就是对中国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无疑是有裨益的。

三、陈钰《试论马桥文化鸭形壶的来源与传播》

此文首先通过马桥文化鸭形壶的特征与中原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件鸭形鼎相比较,指出尽管两地的器物整体造型相近,但检索二里头文化至今鸭形鼎仅出土过一件,显然不是其典型器物,也非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考虑到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存在着文化因素的相向互动,因而作者推定二里头遗址的鸭形鼎有可能是接受南方文化影响的一个表现。既然二里头的鸭形鼎应来源于马桥文化,那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何处呢?

文章首先通过马桥文化中鸭形壶与良渚文化中的皮囊式壶和鸟形提梁壶比较,指出两者特征有异,另外,依据新的考古资料,在时间上,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尚有钱山漾一、二期文化的过渡阶段,而在此过渡阶段至今尚未发现类似的壶,故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鸭形壶起源于良渚的观点是值得斟酌的。

次而,文章还特别讨论了另一代表性观点,即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浙南闽北地区以江山肩头弄期第一单元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作者围绕三个方面即长江下游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马桥文化的陶质陶色以及鸭形壶的纹饰特征展开讨论,最后,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当是那个时期当地先民对鸟禽崇拜的意识,结合了太湖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而在马桥文化分布区内所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

文章第三部分,是重点讨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向周围扩散的问题。作者通过对马桥文化鸭形壶中 B 型(原发掘报告将鸭形壶分为 A、B、C 三型)的详加分析,认为该文化中圈足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当早于假圈足和圈底或凹圈底的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因此从浙西闽北的肩头弄仅出有凹圈底鸭形壶来看,恰恰说明它应是受到马桥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马桥文化之后,作者又通过对安徽潜山薛家岗、特别是福建闽侯黄土仑和光泽池湖商周墓葬以及江西鹰潭角山窑址中出土的一些近似于鸭形器物,从而认定马桥文化在创造出鸭形壶之后,向西北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并且在传播过程对皖西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在其与南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又传播到了浙南的肩头弄类型,并影响到了闽北直至闽南。后来又对赣东北和闽西北地区产生了影响。

马桥文化中鸭形壶的来源、去向和传播诸问题是南方早期文明探索过程中大家颇为关注的热点课题。从去岁以来,仅《南方文物》就发表过多位学者的研究论作,这次我们又再次刊发此文,目的是借以倡导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氛围。随着各地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出土,学术争论的不断深入,相信接近或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必定越辩越明。(彭适凡)